

的一系列行动也有怀疑，想利用张丙臣从吉甫身上搞到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情况。赵吉甫将计就计，以张丙臣有地不交粮，有钱不出款，有子不出丁为由在法庭上驳得张丙臣哑口无言，结果反动派什么也没有捞到，使张丙臣受到了应有的惩处，并且也打击了贩卖毒品的王幼卿。吉甫不管到那里任职都不失时机的为民除害，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热爱人民的崇高品德。

一九四二年长葛的形势和全国一样进入了最艰苦的岁月，豫中地区发生了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在这天灾人祸的年头，日寇实行了残酷的“扫荡”，国民党集中兵力疯狂地进攻，反动派包围村镇、地主豪绅横行、土匪趁火打劫，对农民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横征暴敛，使劳苦大众饥寒交迫，流离失所，人民生活在严重的恐怖之中，七月河南党组织根据中央指示相继撤走，长葛县委书记赵一凡转移，各个支部在县委的领导下从事隐蔽活动，只有赵吉甫的公开身份是联保处主任，在形势日趋恶化的情况下，为把工作搞好，吉甫和党员陈伯瑾、辛金生等密切配合依靠群众组织抢粮救济穷苦农民，提高农民觉悟，坚持武装斗争。吉甫还利用合法的身份与伪政权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摧毁他们一次次迫害群众的阴谋，惩办豪绅恶霸汉奸，使长葛的抗日工作减少了损失。

由于赵吉甫的活动与群众接触频繁，被伪政府所注目，对吉甫的行动派人监视跟踪。一次在唆使特务狗咬狗的斗争中不慎身份暴露，国民党政府设计逮捕赵吉甫。一九四三年一月是吉甫与董勤的结婚日子，伪县长张金印，汉奸恶霸陈秀峰、王幼卿等想利用这一天逮捕赵吉甫，围杀共产党员，他们提前两天就派了一个自卫中队，到后河待命，又从新郑县调了一个中队自卫团驻沂水寨听命，一切布置停当，由魏锡堂出面请赵吉甫商议如何参加结婚典礼仪式等问题来迷惑吉甫上当，可这些都被吉甫当面婉言谢绝，但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还是要上门道喜。在婚礼的前一天上午十点左右，赵吉甫接到辛金生、方柏松的情报，说明天陈秀峰等以上门道喜为名，捕杀我们共产党员，请你通知战友迅速转移。在敌强我弱的危急情况下，吉甫沉着冷静地通知战友不要前来贺喜，自己也不露破绽做好转移的准备。一切安排就绪，赵吉甫连夜转移到许昌县蔡庄隐蔽，使敌人捕杀共产党员的阴谋破产。赵吉甫同志终因身份的暴露不能在长葛立足，在党和群众的掩护下由蔡庄转移到浙川，从此吉甫离开了长葛，使长葛党组织失去了一个好的指挥员和战斗员。

赵吉甫同志转移后，找到了皮定均司令与党组织接上联系，曾在豫西荥、汜县任抗日政府县长，在大别山根据地信、应、随县政府任副县长，在

豫西干部团任副营长等职，为抗日救亡工作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赵吉甫同志无论在敌占区开展党的地下斗争或在解放区地方政府工作，都能遵照党的要求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紧密依靠群众开展工作，因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

全国解放以后，赵吉甫同志曾在河南省委党校学习，一九四九年底从事地质创业工作，他工作积极热情负责，重视科学，努力钻研业务，尊重知识，爱护人才，他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祖国的地质事业。

赵吉甫同志的一生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漫长历史阶段，为党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在对敌斗争、党内斗争中始终不渝地紧跟着党，忠诚于党，维护党的革命利益，充分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和革命气魄，赵吉甫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长葛人民怀念你。

老红军韩春荣

韩春荣（1918—1982），董村乡大墙王村人。1936年参加红二方面军，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358旅决死队营长。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44军团参谋长，兼任广州市警备司令部情报科长。

春荣转战南北，六次负伤，屡立战功。1940年冬日本侵略军对解放区实行军事大扫荡时，春荣奉命率部至山西，阻击日军，掩护纵队运输粮食，与敌人一个团的兵力浴血奋战一昼夜，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圆满完成任务，受到纵队通令嘉奖。1946年齐齐哈尔战役炮台屯战斗中，韩春荣带领两个连，担任主攻任务，身先士卒，英勇作战，身负重伤仍指挥战斗，全歼四倍于己之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春荣先后任公安12师副团长和兴宁、饶平县兵役局局长。转业后任国家测绘局一、三分局办公室副主任，四川省测绘局办公室副主任。

1982年病故于四川省永兴县，终年65岁。临终对其子女说：“要顾全大局，不要给国家添麻烦”。

（选自《长葛县志·1991年版》）

壮烈牺牲的抗日游击队队长朱绍曾

朱绍曾（1922—1944），今石象乡唐集村人。幼读私塾，后入国民党独立第一旅三团二营四连当兵。未久升为排长，驻防尉氏、洧川一带。日军入侵时，绍曾随部队转移到鄢陵、扶沟，后联络同事12人携带武器潜回长葛，组织地方武装。

中国共产党长葛县委员会领导的抗日武装组织“战地服务团”，与朱部合并后，改名抗日游击队，绍曾为队长，共产党员李清河、苗铁林为副队长、参谋，抗日锄奸，活动于县东南一带。当时土顽想吃掉抗日游击队，派人劝其归属，遭到拒绝。绍曾率部包围陈秀峰宅院，因陈先有提防未能捕获。1944年春，日军一股途经坡里王村，绍曾、清河、铁林率部事先埋伏，准备截击，因众寡悬殊撤退。3月下旬，游击队征粮、起枪，打击了土顽的气焰，处死了陈秀峰的心腹朱振清，受到民众拥护。陈秀峰对朱既恨且怕，于是授意亲信杨灿文，扬言脱陈自立。杨灿文一面接近朱绍曾，一面以老海钞票为诱饵，拉李小林共做内应，为陈秀峰效劳。朱绍曾年轻气盛，疏于防范，未听从共产党员李清河、苗铁林疏散队员、隐蔽活动的劝告，与杨、李合并，成立长葛抗日救国军，杨、李为正副司令，绍曾为队长。1944年5月14日（农历4月22日）晚，朱绍曾部驻董村西南路庄，杨、李见时机已到，便密报陈秀峰，布好伏兵，当晚将朱部全部活捉，次日上午押至县城东南王庄村三官庙内，中午开始大屠杀。

陈秀峰令人拉朱绍曾出村时，绍曾意识到要遭毒手，不再前行。陈的爪牙宋宪斌说：“不走，也饶不了你，就让你死在这里。”绍曾说：“大丈夫何惧死，只求死个痛快”。宋吩咐刽子手架起铡力，对手握铡柄的王朝玺说：“铡断他的双腿，让他先尝尝滋味，看着他的兄弟们的下场。”接着将李清河、刘富江、高天一等30余人接连拉出，有的用高粱杆裹住铡成几节；有的绑在树上，乱刀砍死，朱绍曾最后在铡刀下壮烈殉难。时年22岁。

朱绍曾被捕的当天上午，陈秀峰令宋宪斌率人赴唐集，将其父朱振五、四叔朱清章、胞弟朱绍禹枪杀于家，二叔朱振昌枪杀于路庄西南地。其岳父全家事先出走，幸免于祸。

（选自《长葛县志·1991年版》）

抗美援朝战争的特等功臣顾洪臣

顾洪臣（1926～1984），乳名虎子，曾用名英斗，老城镇和平街人。其母大墙周乡梁庄村人，少时被卖至临汝某富家做奴，后与漂流到临汝的河北赵县人李凤吾结为夫妇。洪臣6岁丧父，其母回原籍改嫁顾科。未久继父又亡，母子孤苦。1945年被迫入中央军55军工兵3团当兵。1949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入伍，编入50军149师446团2营4连为战士，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1951年初，志愿军突破三八线，追歼逃敌，在议政府（地名）与汉城间的佛弥地（地名）遭到英联邦29旅皇家重坦克营阻击。洪臣所在的4连担任主攻。1月3日晚，趁敌坦克进入山间沟壑，不能高速运动之机，洪臣冒着敌人炮丸迅速接近敌先头坦克，将炸药包塞进履带，把先头坦克炸成一堆废铁，接着冲向第二辆坦克，用爆破筒将其炸毁。此刻，洪臣的炸药包、爆破筒用完了，便握两颗手榴弹跃上第三辆坦克，掀开仓盖，迫敌投降，但顽敌垂死挣扎，洪臣中弹负伤，他咬紧牙关用力将手榴弹投入坦克车内，顺势滚入壕沟，第三辆坦克应声瘫在路上，洪臣只身连续炸毁敌先头三辆坦克，使敌军坦克营陷入死地。志愿军一鼓作气将其全部歼灭。战斗结束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总政治部授予他反坦克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他特等功臣奖章和二级战士荣誉勋章，并颁发立功证书。

1953年洪臣回国，出席河南省首届庆功表模大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转业到洛阳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工作。后调洛阳市废旧物资回收公司任副科长。“文化大革命”期间，洪臣被错误批斗，长期关押，受尽折磨。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始得平反复职。终因伤劳成疾，于1984年9月在洛阳市逝世，终年58岁。

（选自《长葛县志·1991年版》）

长葛优秀教育世家

——高玉洁一家五代人献身教育事业记述

魏昭聪

1994年9月，许昌市向长葛市老城镇前白村高家颁发了“优秀教育世家”荣誉证书，高家的第四代、现任石象乡苗庄小学校长的高鹤举，代表全家出席了许昌市的表彰大会，这既是高家的荣誉，也是长葛人民的光荣。

从清末至今，高家五代人呕心沥血地耕耘在教育战线上，历时一个世纪。情操高尚，事迹感人。他们从事教育的五代人是：高履中、高寿宸、高玉洁和夫人谢慧倩、高鹤琴、高鹤举、高丽、高瑞雪。

第一代 高履中

高履中，生于清末，就学于清廷的最高学府——北京国子监。他去北京上学是按照清廷规定县学三年贡一名优秀学子而选送北京的，称“岁贡”，时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高履中先生亲身经历了清代末年那种腐败黑暗的统治，亲眼看到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瓜分中国的种种暴行，他作为有血性的中国青年，仅仅会读四书五经、会写八股文，根本救不了中国。中国人要想不受屈辱，要想国强民富，只有努力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本领，才会有出路。后来他虽然从事私塾教育，但对学生灌输的大部分是新事物、新道理，勉励学生冲破封建牢笼，冲破陈旧的世俗观念，学习、掌握新知识，特别是要求自己的子女，走出私塾，投身到新式学校中去。并鼓励子女为教育事业献身。由于高家第一代从教的人，有较新颖的思想境界，他们的后人才世世代代都为教育事业奋斗。高履中是这个教育世家的奠基人。

第二代 高寿宸

高寿宸，字松岩，是高履中先生的儿子。生于1887年3月19日。从小在本村（老城镇前白村）随父上私塾，受到父亲新思想的启迪，在国家多难、民族受辱的境遇中，接受了一些先进思想，向往新事物。民国十九年

(1930年)的《长葛县志》第357页上,曾描述了当时的社会舆论:“清末废科举,设学堂。当时风气不开,思心守旧,凡士之考入学堂者,人竟不齿之。或有出洋留学者,则更斥为非类。由此论之,尔时士子,自非目光复远,见闻广博者,从不肯犯众议而就学校。”进步思想影响下的高寿宸,顶住了“人竟不齿”的守旧思想,更不怕“斥为非类”,以博大胸怀、敏锐眼光,毅然决然地离开私塾,考入“许长蚕桑学堂”。毕业后,又考取省城“开封国立高等师范”。高师毕业即回长葛县立甲种蚕业学校任教。民国十四年(1925年),蚕业学校改名为“长葛县立甲种农业学校”,高寿宸被任命为校长。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和社会的发展变化,高寿宸深感一个县仅仅只办一所职业学校,远不能满足社会之需求。在报经上级批准后,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秋,把甲种农校改为普通中学,定名为“河南省长葛县立初级中学”。学制三年,每年招收一班学生。次年春季开始招收新生,学生发展到三级四班204人。学校课程的开设,也一反过去那种“尊孔读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体制,并免除了“策论”、“经世致用、四书五经”等课程,代之以“修身(后改为公民)、国文、历史、地理、数学、外语、博物、理化、法制、经济、图画、手工、歌乐、体育、体操等课程。每学年授课34周,每周30个课时。教学质量明显提高。从职业学校改为正规的普通中学以后,我县教育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后来长葛许多优秀人才皆出自这个学校。

高寿宸先生先后三次担任县中校长。第一次是民国14年(1925年)至民国十七年冬(1928年),当时学校的名字是“长葛县立甲种农业学校”。民国17年春更名为“长葛县立职业学校”,民国17年秋,正式定名为“长葛县立初级中学”;第二次任校长是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第三次任校长是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所以长葛人说:“高寿宸校长对长葛县中贡献最大。”

高寿宸执教县中期间,国难当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企图灭亡中国的时期。他领导全校师生作了许多进步工作。如1927年北伐军到许昌时,他同进步师生一道,连夜在县城至和尚桥火车站15华里的公路两侧,张贴大量欢迎北伐军的标语、传单,迎接北伐军的到来。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他支持全校罢课示威,并鼓动商人罢市,集会游行,抗议帝国主义的大屠杀。还领导学生查禁日货、英货,参加为死难烈士遗属募捐活动。1931年,在他第二次担任校长期间,支持进步师生在县中成立“长葛县学生联合抗日救国会”。组织师生深入城乡宣传抗日。他是一位顾全大

局、支持进步，为发展长葛教育，奋斗不息的人。

高寿宸还有一个特点：不计较名位。他曾三次担任中学校长、两次担任师范学校校长和女子小学校长。当他不担任校长职务以后，仍能安心当普通教员，从不计较名位，只要能为教育作贡献，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情操高尚，称得上是一位德高望众的长者。长葛县各界，为酬谢和颂扬他的丰功伟绩，于1946年春，由县中校长路百占主持，为老校长的六十大寿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在县中大操场上，两台大戏，唱了三天，群众敬送的寿帐、匾额，挂满校园内外。这是全县人民对高老的最高奖赏。

第三代 高玉洁和夫人谢慧倩

教育世家的第三代代表是高玉洁，他也是这个“教育世家”中，贡献最大最多的代表。

高玉洁是高寿宸先生的长子，生于1909年3月16日。他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社会培养，从小就有立志成才的决心。他的学历是：先在长葛县公立国民小学上学，后转入“公立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长葛县立甲种农业学校。1928年夏，又考入开封第一师范，高师毕业后，回到长葛初级中学当教师。

在十几年的求学期间，他的学习成绩，一直都很突出，学校的高才生，且热心于公益事业，有强烈的正义感，时刻忧国忧民，以“振兴华夏，拯救斯民”为己任。1924年冬在甲种农校上学时，经共产党员霍树中的引导、介绍，使他不仅看到了光明，并找到出路。他同黄梅岭、崔南山、谢南松、路木森等十余人一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县第一批共产党员。当时长葛仅有两个党小组，黄梅岭、高玉洁分别任党小组组长，1927年7月，学校成立了中共党支部，高玉洁又被指派为党支部书记。

北伐时期，国共合作，共产党中央曾允许“共产党员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担任其工作”。是时（1925年），长葛尚属北洋军阀的势力范围，国民党也只能秘密活动，他们成立的县党部，也是暗中设在甲种农校，并拉拢过一些优秀学生加入该党，共产党员黄梅岭、崔南山、谢南松、路木森、高玉洁等，加入了国民党，且都是县党部的要员，如黄梅岭既是县党部的执行委员，又是共产党长葛县委的负责人，高玉洁任国民党县党部的宣传委员，1927年的6—8月，还担任过国民党长葛县临时执行委员，在共产党内，他仍是学校的党支部书记。1927年5月，北伐大军到达长葛，国民党县党部才由秘密转为公开活动。同时，也由于蒋介石的叛变革命，国民党右

派掌权以后，国共才开始趋于分裂。

1928年7月至1931年7月，国民党曾两次派员到长葛“整理党务”。经过“整理”恢复建立了国民党长葛县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先把原来的共产党人全部排斥在外，接着大举“清党”，许多共产党员被逮捕或杀害。1928年高玉洁适逢中学毕业，潜入开封，考上开师。从此，他与共产党、国民党双方断绝了一切来往，专志求学，变成了一名无党无派的普通师范学生。在爱国抗日活动中，他还不失为一个爱国青年。如1931年冬的“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参加了开封的“联合救国会”，并参与罢课和游行示威，积极宣传抗日救国。

1932年回到长葛县中当教师，1934年春季还担任了长葛县初中的校长，按当时的官方规定：师范毕业生的学历，不能担任中学校长职务，经与县教育局协商，改任长葛县第一小学校长。

他去开封求学时，就立下宏愿：要象父辈那样，献身教育事业。担任长葛一小校长后，他“大有用武”之地，工作得心应手，可以大展才华，决心要为长葛的小学教育闯开一条光明大道，作出榜样以激励后人。从此，他兢兢业业，含辛茹苦，在长葛一小整整躬耕了十五个春秋。为长葛的小学教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长葛人民怀念高玉洁这位德高望重的校长。于1947年秋，由城厢士绅发起，各届老师同学自愿捐助，在长葛一小的大操场内，办起了一场隆重的庆祝活动，用当时我县最盛大的方式——请大戏一台，连演三天，热烈庆祝高玉洁的教学功德。会上还发行了“纪念册”，是当时我县最高的祝贺形式，也是我县人民给高玉洁的最高奖赏。

解放后，长葛县人民民主政府代理县长张泮英，纵观了高玉洁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的所作所为以后，在一次大会上感慨万状地说：“高玉洁是宁愿干大事，而不愿当大官的教育事业家！”

1949年，高玉洁离开长葛一小到河南大学进修，河大进修以后，分配到叶县任教，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59年病故在焦作农场，1979年被彻底平反昭雪。

第四代 高鹤举 高鹤琴

高鹤举是高玉洁的儿子。生于1950年。于1987年，破格提拔为该村小学的校长。通过自学1989年考入河南大学教育管理系。又经过三年的刻苦

努力，获得省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的大专毕业文凭。1994年高鹤举荣获“许昌市优秀教师”称号。

高鹤举不仅当校长抓行政，而且还一直担任着毕业班的班主任，是教学上的排头兵，谁都知道毕业班任务重，时间占用多，但他不辞劳苦、耐心教学、精心辅导，使升学率一直领先，被长葛市教委评为全市“十佳青年教师”，从而由民办教师转为国家正式教师。

为了更好地发挥“十佳教师”的先进作用，石象乡党委决定：调任高鹤举为苗庄小学校长。但胡杨庄父老乡亲却坚决不同意，他们说苗庄的孩子是学生，难道俺胡庄、杨庄的孩子不是学生。不能把俺的好校长给俺调走！他给所教的五年级同学上最后一节课时，全班同学竟号啕大哭起来。后经乡领导再三劝说，才将高鹤举调往苗庄。1996年，他到苗庄中心小学后，一手抓学校的常规管理，一手抓教学质量的提高。很快使苗庄小学跃入全市先进小学行列。当年就被市委、市政府评为“长葛市文明单位”。

高鹤琴，1943年出生，中专文化程度，从事教学工作三十多年，现在任教于祖国北疆大庆市石油学校。

第五代 高丽 高瑞雪

祖辈、父辈曾要求子孙后代继承遗志，为教育事业作出不懈奉献。面对祖先遗训，高鹤举象父辈一样，要求自己的后代也要“严遵家训”。他的女儿叫高瑞雪，在校上学时，成绩优异，学校领导曾劝她报考航校，鹤举知道以后，马上跑到学校，找着女儿，语重心长地述说了祖父遗言，使女儿倍受感动，于是改变初衷，考上了许昌师范学校，并立誓要做一名合格的园丁。她毕业后被留在许昌市任教，曾获得许昌市教师基本功比赛一等奖。高玉洁的另一孙女叫高丽，现在灵宝市一中任教，且连年被评为先进教师。高家五代书香门第。先后八人从事教育，且人人都有建树，被许昌市评为“优秀教育世家”，真是当之无愧！

（作者魏昭聪：长葛老城镇人，解放初期参军，长葛市商业局干部）

田零自传

田 零

我原名刘瑞峰，1916年2月11日生于河南省长葛县西洼李村一个普通农民的家中。童年时家中两次遭袭劫，长工越墙背我逃至村外坟坑过夜。军阀败兵拉走骡马，赶走大车，恐惶终日，避难渑水寨。七八岁后方在家中私塾念“四书五经”。闻后河镇开办了学堂，偷偷考上高小，喜欢涂鸦，图画得过双奖。高小毕业上了长葛县中，后又上了洛阳师范，学习到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侵略破坏了我当诗人、文学家的美梦，毅然走上抗日救亡的途径。

日寇飞机轰炸，迫使我离开洛阳师范，寻找抗日救国的法宝。因平型关大捷，认识到救中国只有投靠八路军，跟中国共产党走。1938年9月11日，奔上赴延安的路程。到达延安，先被编入抗大七大队，又转三大队，约学习三个月，听过周恩来的政治报告。鲁迅艺术学院招生，考入美术系，终于使我梦寐以求的学习画画变成了现实。

1939年1月至7月初，在延安“鲁艺”学习。毛主席亲自讲话，为我们送行于南门外河滩上。我请求毛主席在日记本上赠言留念。他号召“坚持抗战到底！”

1961年“八·一”建军节时，我曾写诗“忆延安”，留恋在延安生活的美好情景。诗云：

清凉山下延水清，涟漪澄澈沐群英。
夜闹窑洞亮星斗，朝霞坡上垦荒荆。
崖畔石凳读马列，河边操场练新兵。
塔影话别赴敌后，主席赠言铭心旌。

经过三个月艰苦的行军，到达华北敌人后方的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建立了华北联大，我又继续学习半年，1940年春毕业后留校在文工团美术组工作。后来学习了木刻，刻了一套木刻组画《边区妇女》，1940年在纪念“三·八”妇女节的会场展览，其中《扭秧歌》一幅发表在《五十年代》杂志上。8月，我被选为边区“美协”秘书长，驻会主持会务。在根据地处于最艰苦的年代，协会撤销，我调到军区抗敌剧社，下乡到五丈湾采

访民兵李勇的事迹。编绘连环画“李勇大摆地雷阵”，石印散发于北岳区农村，促进了地雷战的开展。

1943年日寇对边区进行了三个月的残酷扫荡，在平山县柳里河，我同民兵队长一起，坚持夜宿山头七天七夜。1944年秋，党调我南下河南洛阳地区，因渡河失足落水得救，闹起痢疾未走了，留下进党校参加整风学习。1945年夏，到冀察区新华社支社任记者数月。在日本投降后进入张家口，有了比从前好的画画条件，又请求回军区抗敌剧社作美术工作。三月份又给我分配了工作，华北局宣传部长周扬对我说：“你还是去搞普及工作吧！”我没言语，服从分配，到了《大众日报》社任美术科长。每周出一版画页，反映城市工人的生活、生产、支前工作。为了熟悉工人，经常下工厂了解情况，画速写，狠下决心自学，提高业务水平。在采访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时，随代表们到西苑飞机场欢迎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党中央领导进北平。另外，我曾在中南海怀仁堂采访欢迎何香凝进北平，请邓颖超、许广平为报纸题词。我把在妇女代表大会期间采访的李秀真的事迹，编绘成连环画，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作进一步加工成素描画，配诗并改名《苗大嫂》，由上海《晨光》出版社出版成小册子。全国第一届文代会期间，我见到马达老师，征得他同意，我去天津工作，以期做专业画家。待《大众日报》改名《工人日报》后，不计划再出画刊了，领导同意我离开报社，遂去了天津。初在市“文管会”（后改名“文联”）工作，1950年又分配我到天津艺术馆任副馆长。1952年秋，我又回到北京“华北人民”杂志社任美术组长，仍以普及工作为主，多次下农村搜集素材，编绘连环画发表。出乎我意外的是1953年秋天，杂志社撤销，我被调进北京人民美工室，使我终于进入了专业队伍，有了充裕的时间提高绘画技巧，夜以继日的苦练素描、水彩、油画。1955年至1957年，又跟苏联油画家马格西莫夫进修学习油画，打下了创作油画的基础。上山下乡到工厂搜集素材，画风景和人物形象。几年间除习作人像、裸体、风景外，创作了几幅受欢迎的作品：《来社工作第一天》（素描）入展全国第二届美展；《揭发暗藏的反革命》（宣传画）、《支援解放台湾》（宣传画），均由“人美”出版，后者在第三届美展展出；《秋天》（油画）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新苗茁壮》、《炊烟》、《运矿石》等写生画，前者编入《田零画集》，后者发表在《战线杂志》。1957年建军三十周年画展展出《戎冠秀——子弟兵的母亲救护伤员》，有十多份报刊发表，作为我的代表作编入《现代中国美术家名鉴》，1958年创作的《分秒必争》送往莫斯科，入展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

会。当时苏联由《星火》、《造型艺术》发表并评论，还编入《十年中国绘画选集》，《人民日报》，《中苏友好》杂志均以发表。正如画家李玉昌在《我所认识的画家田零》一文中所说：“……引起了美术界的轰动。因为中国的油画能够在苏联获得成功是极为罕见的。《分秒必争》成功的塑造了新中国钢铁工人豪迈的形象，在艺术处理上也有独到之处，特别是运用冷暖色调对比，描绘出强烈火焰所照射的热烈场面，组成了一幅激动人心的色彩交响曲，令人看后精神振奋不已。”

建国十周年，我创作了《雨中》土高炉炼铁，赞美那些为战胜贫穷落后而拼搏的干劲；又画《坚持敌后武工队》，颂扬为新中国建立而付出鲜血生命的战士，充满激情地为革命者树碑立传。但是，我真实的反映了农村三年自然灾害的情况时，却遭到了批判斗争的厄运，被迫下放农村劳改。1962年，虽然为我平反赔礼道歉，但摧残了我的革命锐气，打击了我为革命创作的热情，实在是难以补偿的。1961年，我在病中反思，我所坚持的为革命画画的道路，是任何污蔑歪曲所不能抹杀的。心情平静下来后，又继续积极地追求艺术水平的提高。在小汤山疗养院养病过程中作风景写生画，为病友画像，探索油画中国民族化的路径，向北京市美术公司创作室国画家们学习写意画的笔墨技巧，虚心向老国画家学习，大练基本功。我画的《棕榈》得到书画家郭凤惠的称赞，画的《石榴喜鹊》在“市美”展出，后又在香港印挂历，和王铸九合作的有《瓜兔》。李苦禅为我画《鸽子》题词。从而使我认识一条真理，不论什么事业只要肯下苦功钻研是会取得收获的。这一时期我创作的油画《织地毯》、《雪霁》均在市“美展”上展出。1963年春节，在福建海防前线慰问，写生40多幅油画在厦门展览，后精选十余幅，加工制作参加了“海防写生画展”。《巡逻归来》发表于《解放军画报》，并被选入《海防写生画集》中。风景油画《傍晚》，入展于“农村新貌”，《人美》印了画页。1963年冬，美术公司创作室撤销，我又被迫离开创作岗位，调到市文联美协筹备会任副主任，主持美术的组织创作展览活动。

1965年，“美协”筹备会和北京中国画院合署办公，文化大革命又遭浩劫，我被打得皮开肉绽，气死三次。“美协”遭否定，留我在画院继续画画，这该是因祸得福吧！1969—1970年，我被下放农村，搞所谓斗批改。后回画院，“四人帮”倒台后，为院展创作《华主席视察郊区农村》。1977年冬，下山西、湖南醴陵、广东惠阳，搜集左权将军的事迹，为邯郸烈士陵园左权将军纪念馆创作《左权青年时代参加地下革命活动》。冲破不准去外地深入生活的禁令，画院组团到山东胜利油田、泰山、大渔岛、青岛、烟台

等地写生，开阔了视野，打破了闭塞的局面，写生了十余幅作品，于紫竹院公园和画院油画创作室参展。

从1978年至1989年，遵古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旨，先后游览，南抵天涯海角，北临大庆油田，胸储万物，天地广阔，消除了闭目塞听之苦闷。所到之地，无不留下我的绘画作品。并得各地之助，在长春、南京、昆明、韶关煤矿、石家庄、兰州、洪湖、北京举办个人画展，达到我服务人民之目的。另外，还于北京、乌鲁木齐、济南、安阳、武汉、柳州、芜湖、吉林市参加联展八、九次之多。1981年10月，在芜湖举办的十人联展，是最有影响的一次，北京和芜湖各有五位画家参展。文联主席周扬参观后给了很高的评价。

为了庆祝我从事美术工作五十周年，在北京大观园和北海公园两处举行了国画展览，北京电视台作了报道。1989年，《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印了《田零画选》，《中国青年》出版社印了《田零画集》，是对我创作油画和国画的一次小结。我愿在此基础上，勤奋耕耘，再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我的国画，也多次被选送去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美国、香港展览。1987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汤马丁向我进行了录像采访，在美国进行了广播。我不图名利，忘怀得失，追求多为革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作奉献。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为修复长城、亚运会、安徽救灾集资，多次捐献作品，为慕名索画者，无不一一满足其要求。特别是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画一百幅，为台湾残障人杂志主编翟平洋先生也赠画数幅，聊表同情。为了海峡两岸的艺术交流，曾赠画一百件给台湾国际美术协会会长张文宗，以期达到祖国之统一。今年2月11日至16日，他在台北华视艺廊举行画展，印了画册。为晋察冀文艺研究会筹措资金，我捐画五十幅。今年5月14日，在郑州河南省博物馆举办了“田零捐献书画展览”，共计捐书画四百五十三件，其中有我收藏的名家书画239件，我自己的油画、国画214件，被誉之谓：“艺高德馨，情系故土。”

现在我已进入77岁高龄，身体尚健，愿继续发挥余热，画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奉献给我的祖国和人民！

1992年7月12日

铁骨铮铮路百占

魏昭聪

路百占字梅村，生于1913年，长葛老城衙后街人，1991年与世长辞。他一生敢说、敢为，所表现出来的努力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的品格，在长葛大地上一直被广为传颂。2003年初，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访了许多老人及其亲属，回顾了路百占铁骨铮铮的一些往事，现整理成文，谬误之处，敬请知情诸公予以指正。

一、聪颖、好学，热诚、敢为，为人称道

1934年，路百占考入河南大学，因家境贫寒，中途曾辍学一年，直至1939年才大学毕业。在河大他是文史系的高才生。当时在河大执教的著名教授很多，如文史系主任嵇文甫、江浙籍史学家范文澜、吉林名流高亨等，都是全国著名的饱学之士。在他们的陶冶之下，路百占的学识、情操不断升华，在学生时代就表现不俗。他先后完成了《名字学研究》、《楚辞发微》（前卷）、《昭明文选笺注》、《贾谊新书校注》等作品。路百占学业上有成就，生活中也是热心人。河大由开封西迁时，学校给每个学生都发放了一些路费和生活费，由于战时物价飞涨，到豫西潭头镇时，很多同学已经手无分文，只能靠学校每月发8元贷款维持最低生活，日子过得非常清苦。路百占在离开开封之前，将所发的纸币，都兑换成银元或金戒指，在极需用钱时，就抽出一点，再兑换成纸币，加上省吃俭用，所以西迁的路上，他没有受到纸币贬值的冲击。到潭头镇后，他不时拿出一些帮助穷困的同学，如长葛的河大同学罗培锋就受过他的接济。他的豪爽行径，得到许多人的尊敬。

在河大学习期间，他还与一些同学组织了一个“社会学研究会”，经常请教授作学术报告和时事讲座，让各流派学生参加研讨辩论，共同探讨学问。每次辩论会前，他都找一些知识较丰富的同学，事先作充分辩论准备，使研究会开得一次比一次精彩，参加辩论会的同学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有一次是关于“中国的前途”的辩论会，全文史系都参加了，还邀请几位教授到会指导，几位同学作重点发言。不料，学校的“三青团”也带了一帮人到会，其中还有从省里来的人，很明显，这帮人是企图捣乱的。辩论一开始，就明显地表现出了观点的分歧和尖锐对立。省里来的人不断向参

加辩论的“三青团”人员递条子，指示“方向”。爱国青年是各抒己见，辩论十分热烈。“三青团”派的人被驳斥得理屈词穷，十分狼狈。在无言以对的窘境中，省里的“指导”竟掏出手枪，威胁在场学生。关键时刻，路百占挺身而出，第一个挡在枪口面前，同学们随之一拥而上，把持枪人围在中间，纷纷指责他们这样做是对河大自由、开放校风的破坏。双方剑拔弩张，互不相让，在众多教授的调停之下，才没有使矛盾激化。色厉内荏的“指导”不得不灰溜溜地离开会场。从此，学生中的正气更加上扬，路百占也被公认为学生领袖，说他是“敢言人所不欲言，敢发人所不妄论”的有骨气的青年。

二、抨击时弊，陷身牢狱

1941年暑假，路百占从镇平返乡（路百占毕业后，谢绝留校当助教的挽留到豫西高中任教，后转镇平），耳闻目睹了以陈大肚为首的地方豪绅恶吏对农民的敲诈勒索等许多不平之事，愤笔疾书，写了一篇题目为《好人在哪里？》的檄文，对旧社会的黑暗予以抨击。文章的大意是：全县的区长、联保主任和保长，不顾抗日战争的艰难，在大敌压境之时，仍横征暴敛、徇私枉法，结党营私，鱼肉乡里。横行于闾里，钻营于公门，霸产掠财，枉造诬陷，官官相护，朋比为奸，有法不依，公平丧尽。如此下去，何以驱日寇，振中华！《长葛日报》社社长高基亭看后拍案叫好，可是要刊出这篇文章是要冒风险的，必须征求县党部书记袁正卿的意见，高就去县党部找到袁正卿并得到袁的默许。

当时《长葛日报》是国民党长葛县党部主办的刊物。刊登此类文章自有其原因：时任县党部书记长的袁正卿系城内古仓街人，毕业于西北大学，曾任郾城县高中校长、安阳和济源等县教育局局长，与知识界感情素浓，对豪强恶势，历来鄙视、厌恶，属县内有名望的士绅。他来长葛任县党部书记长，县长唐绍庭与地方上的实力派人物沆瀣一气，并不买他的账，袁正卿心里早就窝了团火。看了这篇文章，他认为抨击土豪劣绅是对地方正派力量的支持，更是替自己出气，加上报社社长高基亭是路百占的好友，出于共同义愤，便将这篇抨击当局的战斗檄文刊登出来。

文章登出后，全县震动，互相传阅，奔走相告，人人拍手称快。因为它切中时弊，说出了民众心里早就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但此文却触怒了当道的恶势权奸。路木森等三个区长领头，率领刘本初、郭济臣、杨旭初等几个联保主任，聚集到长葛实力派头头陈大肚家，共同商议如何处治路百占。当时有人主张暗杀路百占；有人主张砸垮报社出出气，均被陈大肚制止。他认为

用示威的办法，既可以吓唬住路百占，又可以大显他们这些人的势力，此法最合适。但不要冲击报社，因为那是国民党办的报纸，弄不好会受到上级的干涉。经过秘商决定：由各区通知所属各联保主任和保长，带上各区、保的印章，以来县领取上级下拨的军麦款的名义到县城集中，然后再统一行动搞游行示威，要求惩办路百占。

次日，全县的所有联保主任和保长聚集到县城后，才弄明白不是领款的，而是陈大肚等人整治路百占而设计的计。中午，陈将这些人安排到大街的“张林饭庄”大吃大喝。并煽动说：“不论花多少钱，概由路百占还账。”吃饱喝足以后，全部集中到东关外的圈神庙内，由联保主任刘本初、杨旭初、郭济臣、赵冠五等负责指挥。一区区长路木森代表各区长讲话，作再次煽动，说路百占的文章是对他们的污蔑，煽动群众与政府作对等，要政府严惩路百占，否则，就是政府不给他们撑腰，坚决辞职不干。然后由三个区长领头，并派出陈大肚的一百多名腰插盒子枪的黑打手助阵，率领联保主任、保长等四、五百人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威风凛凛，经东大街、南大街、衙前街、冲向县政府，一路高喊要严惩路百占，不“押起来”路百占就全体交印，气焰十分嚣张。游到县政府，集结在大礼堂，呼喊之声更加刺耳。

县党部方面得知游行闹事的消息，袁正卿非常气愤，立即命令县党部成员和报社人员，暂时隐蔽以免遭到冲击，同时指示党部干事赵庭赞，到县境以外与新郑、长葛县交界的一个村，遥观事态的变化，如果他们搔扰县党部，就立即电告省里和洛阳战区长官司令部，请求派兵镇压；又派社长高基亭立即通知路百占，作好一切准备。自己则独守县党部，观察事态发展。

保长们的游行队伍在礼堂大闹时，政府派秘书出面假意调停，实际是煽动，唯恐气焰不足。傍晚时分，县长唐绍庭才派人把路百占“请”到县政府，要他亲自去向保长们道歉。路百占理直气壮地说：“鲁迅写了那么多文章，鞭挞时弊，也没见出什么事。我这一篇短文，竟惹出这么大的祸，看来长葛的确是很特殊。”在县长非要他到礼堂与保长们见面时，路环顾了一下左右，然后大声一语双关地说“我可以去，不过，你这县政府太黑暗了，看不到一点光明，请你派卫兵提来马灯，在前面引路。”唐绍庭十分不自然，只得硬着头皮，假装不理解似地照办。刚到大礼堂，那些人又起哄起来，有的喊路百占破坏抗战，捣乱后方；有的喊路是汉奸、共产党，是想夺权！路百占面对挑衅，镇定自若，响亮地回答：“我路百占不是当官的料，我有我的职业，用不着夺权，至于谁是汉奸走狗，老百姓看得最清楚，还用我解释吗？”双方僵持不下。在这种情势下，唐县长故意问路百占该咋收

场。路讥笑说：“你是县长，懂得国家的法律，但我没有犯法，你看着办吧！”台下又有人煽动把路百占押起来。唐绍庭假装迫于压力让路百占先委屈一下，就派人当堂钉镣入狱。钉镣时，路百占处之泰然，哈哈大笑说：“你们怎么给我钉上，怎么给我去掉，我不信天下没有说理的地方。”面对着路百占的不屈不挠，四、五百人的大礼堂，顿时哑然无声，许多保长呆若木鸡，耀武扬威之势已十去八九。在钉镣后，狱卒在脚镣上拴了一根小绳交给路百占说：“走着掂着这根绳，就磨不破脚蹠子。”一根小绳，一句话，说出了老百姓的心声。

进狱后，狱卒在靠近大门处，为他打扫了一间房，搬来床、凳，这是其他犯人享受不到的待遇。友人罗培锋送来被褥等生活用品，并给包了一家饭馆，每日三餐按时送饭。他又向罗培锋要了一套《红楼梦》供狱中消遣。尔后，天天都有一些农民、商人、学生到狱中探望，顺便送些毛巾、水果、糕点之类东西。去探望的有些人提议要“劫狱”，路百占坚决制止。他只在狱中看看小说，与狱卒聊聊天，好像没事似的。

路百占的出奇冷静却让唐绍庭、陈大肚等发了毛。他们知道路百占恃才傲物，天不怕地不怕，况且路的同学在省里也有诸多关系，绝对是不好惹的。本意是想杀一杀这个狂傲青年的威风，以便屈服后，为其所用，不料路百占软硬不吃，住到监狱里仍泰然自若，没把他们放到眼里，毫无屈服之意，颇有“抓着容易放着难”的感觉。唐绍庭则派秘书去见袁正卿书记，再三解释说押起路百占是权宜之计，请县党部不要误会，不要向上级报告。事实上县党部已经上报省里了，袁正卿不买县长的账。陈大肚又和三个区长请他赴宴，袁正卿坚决拒绝。唐、陈只好托人去向路百占说情。先请长葛名流前清举人王秉钧和拔贡张清臣，他俩都以年老无能相推辞；又请士绅丁清如去说合，路百占拒而不见；不得已只得请出路百占父亲的好友，县财务委员会主任李广庭去做说客。李广庭按陈大肚嘱咐，提出四条要求：一、出狱后不告状；二、留本县工作；三、满足要求，用多少钱就给送多少钱；四、同陈大肚和三个区长换帖拜朋友。路百占逐条一一驳回：一、我管我自己，别人告不告状，我管不了（双关语）；二、我已受聘于豫西高中，人不能言而无信，不能留本县；三、我不需要花钱，即使有困难，也绝不找他们；四、我不会同他们拜朋友，如果同他们换帖，那不是他们怕我，就是我怕他们，将来叫后人如何评说？况且我仅一介书生，不想攀高权贵。李广庭听后，激动不已，拉住路百占的手再三叮嘱说：“贤侄！言而有信，说得有理，应该抓紧时间回校，来日方长，要好自为之！”唐绍庭、陈大肚听了回

信，亦无可奈何，不得不屈从于路百占的大义凛然。于8月18日放路百占出狱。学生、商人、普通百姓听说路百占出狱的消息，早已在狱外等候，夹道欢迎。唐绍庭也亲自迎接路百占出狱，他拉住路百占的手假惺惺地说：“让你受苦了。”要路百占给他个面子，千万不要上告。路百占不屑一顾，挥手示意走出人群。第二天凌晨，路百占便离开长葛，回到镇平高中。

路百占回到镇平，激愤难平，多次投书控告，但总是石沉大海。因为当时统治河南的第一号大人物是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卫立煌，卫与唐绍庭是安徽老乡，且还有亲谊。有此特殊关系，诉状虽“盈尺”仍得不到理会。路百占一封加一封的投诉不得结果，愤怒之情，常形于色。学校有位张仲凯老师，见他情绪激愤，遂与之交流后，甚表同情。言他与郑州行政公署督察专员杨一锋是旧识，愿代为转达冤情（当时长葛县属郑州行署管辖）。路百占十分感激，详细写了一份诉状，交张仲凯转呈。

中条山战役国民党军队彻底失败，战区司令卫立煌被撤职，派蒋鼎文接任，同时军政分开，省长由李培基接任，上边的根子变了，唐绍庭也失去了靠山。

郑州行署专员杨一锋，新乡人，北京大学毕业，为人耿直，办事认真，是当时官场中少见的专员，对唐绍庭等的贪脏枉法行为，早有所闻。今接友人张仲凯转来的诉状，非常震怒，当即派员调查后，电令唐绍庭、杨景贤、郭奠五、翟慎修、李广庭等到郑州“开会”。经审讯，李广庭如实交待了长葛的全部情况，县长和三个区长立即被解往洛阳，银铛入狱。直到1943年，中原大旱，战争频仍，为节省囚粮，才允许仨区长取保释放。

路百占告倒了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的区长和与之相勾结的县长，确实给长葛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给老百姓出了口气，人们对路百占赞美有加。于是，百姓们自发地编了许多顺口溜在田间地头传颂，在街头巷尾当戏唱。1993年，县文化馆邢贵冬先生到大周镇搞调研时，该镇小谢庄的老农，还清晰记得当年他们自编的一段唱词：

路百占提笔不用想，先告大肚和县长。

区长保长都带上，联保主任一扫光。

他们欺压老百姓，任意派款又派粮。

……

陈大肚一看事要“鼓”，

忙去找前白的高孚五（高是省水利处长，前白村人）。

高孚五说这事我不管，

陈大肚一听傻了脸。

……

几十年以后，老百姓仍能传唱着那时候的民谣，可见路百占在当时的影响，是多么深刻和广泛。

三、与权贵匪霸面对面较量

1945年日本投降，全国欢庆。路百占回到长葛，担任了长葛初中校长。学校经过一番整顿，面貌焕然一新，师生团结，正气上扬。此时的县教育科却长期扣发教师工资，给教师们的生活造成很大困难，无法维持教学。当时的教育科长是高凤池，新郑人，原任县中校长，是教育界不学无术的“政客”，曾因多次驱逐进步教师，开除爱国学生而被县中师生赶出校门。日寇投降后，他多方钻营，又谋得教育科长宝座，今又扣发教师工资，实属教育界的败类，全县师生恨之入骨。路百占了解了高凤池克扣教师工资一事，非常气愤，率领县中师生，冲到古仓街高凤池的官邸，上百人一轰而上，不论桌、椅、板、凳，盆、碗、瓢、勺一顿大砸，就连高凤池头上戴的所谓“缸盆帽”（绅士们的硬盔礼帽）也被抢下来，掷于地上，用脚踏扁，弄得高凤池颜面扫地，再也不敢扣发教师工资不说，不久便灰溜溜地逃回新郑老家，从此滚出教育界。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委派翟树堂任长葛县长，接替陈大肚的代理县长。他到县接任时，各界人士在城隍庙戏楼前举行了新旧县长交接仪式，县中学师生亦列队参加。交接时各界代表都发言祝贺，恭维有加。唯独路百占校长的发言，语惊四座，他说：“过去来长葛的县长，都是吸食长葛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没有一个好家伙！他们都认为长葛是块“软”地，“软地”好起土嘛！长葛的县长都是刮地皮的能手，长葛人吃够他们的苦啦！翟县长可能不是刮地皮的那路人，希望你不要当贪官，要当长葛人的“一头牛”，否则，有我路梅村在，绝不会放过任何贪官污吏的。”在公开场合，这种直言相讯的一番话，博得全场数百人长时间的鼓掌欢呼。弄得卸任的陈大肚和新到任的翟树堂满脸羞惭。在台上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搓手顿足，无言以对，形象十分狼狈。后来翟树堂大概看出长葛大堂不好“坐”，上任不到两月，就匆忙辞职离任。

1946年春，国民党为应付中外舆论，不得不开展“禁烟禁毒”活动。派到我县负责禁烟工作的是一个姓纪的委员。事实上地方上掌握实权的人物，大都是贩毒或吸毒的“能手”。他们根本没把这位“钦差”放到眼里，连食宿都不给妥善安排，只把他安排在警察局那些巡警的伙上就餐。纪委员

对此很不满意。对缉毒工作他也曾纠集几个警察，对一些不起眼的吸毒者，在其门旁钉上“×××吸食毒品”的黑牌子，企图吓唬这些穷烟鬼给他送几个钱，以便消灾去祸。哪知穷烟鬼本来就是下贱货，哪有钱送给他，于是纷纷逃往乡下避难。纪委员没捞到油水，认为可能是有人背后操纵，必须扣上帽子，镇压一番，或许会有所收获。于是在警察局操场上，召开禁烟大会。会上只字不提禁烟禁毒，却大讲特讲共产党“共产共妻，青面獠牙”等谣言，并吹嘘自己学识渊博，能耐广大，是省里挑选特派到长葛视察的高官，各界必须认真服从……讲话后，大大咧咧地仰坐在讲台中间的靠椅上，俨然一副大官的气派。路百占在台下实在忍耐不住，不等会议主持人的提名，就跳上了讲台，挖苦着大声喊：“纪委员不愧是省里来的大官，见多识广，大家给他“呱呱、呱呱！”喊罢带头鼓掌。台下商人、学生一齐跟着拍倒好，连着拍了三次，弄得纪委员面红耳赤，从椅子上腾地跳了起来，指着路百占说：“你是什么东西？胆敢挖苦我？”二人当场吵了起来。路百占指着纪的脸质问：“你在啥地方见过共产共妻？”恼羞成怒的纪委员也指着路百占大骂说：“你就是共产党！”路百占回奉说，我不怕你给我戴红帽子，可我问你，你的职责是缉查毒犯，几个月来你抓住了几个卖海药的？在今天这个禁烟大会上，你讲了几句禁烟的话，你的职责何在？弄得纪委员哑口无言，无法在台上站了，抢着跑下了台，嘴里唠叨着“你别走，看我抓你这个共产党！”没等会议结束就溜回了警察局，大会无功而散。纪委员回到警察局，气恨难消，就编写整治路百占的黑材料。警察局有人马上就把信息传给了路百占。路毫不示弱，连夜罗列了纪委员到长葛后的12项罪状。第二天早晨，他在东关雇了一头毛驴，直奔省城开封，把纪的12项罪状，亲手交到省政府，那位不给国民党政府争面子的纪委员，不久便被免职。

路百占调许昌后，在省立第四中学任教。学校有一位姓李的老师，是临颖县人，正义感强烈，敢作敢为，曾多次抨击他县的土豪劣绅，遭到那些人的忌恨。1946年秋，临颖县派黑枪手在大白天闯入四中教室，把正在上课的李老师绑架出学校，眼看刚直的李老师就没命了。学校领导慑于黑势力却不闻不问，引起全校师生的共愤。在这人命关天的时刻，路百占闻讯挺身而出，组织全校师生，分头追赶夺人。学生们在天平街、北大街、南大街，直到火车站，沿路搜寻，终于在火车站附近的一户居民家中，把被五花大绑的李老师从一个露天的小屋里解救了出来。回校后全校师生欢呼雀跃，师生们对路老师正义感强烈、临危不惧、无私无畏、敢作敢为以及果断的组织才能，无不钦佩万分。大难不死的李老师更是感激涕零。从此路百占成为学校

最受尊敬的老师。

1947年8月，长葛开始竞选“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简称国大代）。在省立许昌四中任教的路百占，全身心的扑在教学工作上，无暇考虑别的事情。而全县人民，尤其是知识界都认为路百占最能替老百姓说话，最能代表民意，此权不能旁落，一致吁请路百占回县参加竞选“国大代”。此时的路百占才从书丛中“清醒”过来，意识到众望所归，自己必须争取到这个能代表民意发表政见的讲台，遂决定回县参加竞选。临回县之前，他召开了两次“旅许同乡会”，同仁们共同分析了长葛的竞选形势，研究制订了竞选策略：认为竞选的主要对手是陈大肚。陈有权有势有钱，但不得民心，只不过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大土匪，黑枪手。只要精心组织，一定会战胜对手。同时还组织了旅许的七、八十位中学生，要他们集体请假回县帮助选举，要求在各个选举点上，敢于争取，敢于斗争，义务参加监察揭发，并替不识字的农民代写选票。与此同时向全省各地长葛籍的教师、党政官员、商人发函，并得到旅外人员的一致声援，造成路百占参加竞选的浩大声势。在县里工作的知识界人士，如训练所教育长罗培峰等，还替他印了数千份参加竞选的传单，在全县分发。竞选前路百占严正声明，退出国民党，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这些活动都极大坚定了长葛各界人士要投票路百占的信心。

选举共拟定了四个竞选人：陈秀峰（即陈大肚）、路百占、张缙云、郭奠五。选举点定在县城、岗李、董村等七处。选举时组委会派县中和许昌回县的中学生，负责在各选举点替不识字的选民代写选票，并规定必须使用毛笔、黑墨、正楷书写，不准潦草，不准写错别字，不准洒墨，否则该票作废。

选举那天，沉寂破败的长葛县城，顿时热闹非凡：有腰挎手枪、走街串巷、恫吓威胁、争拉选票的；有官僚政客的帮闲者，声嘶力竭，扯破嗓子为主子作欺骗宣传的，不一而足。各选点的学生则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他们制做了“请选路百占一票”、“路百占是老百姓的真正代表”等巨幅标语，贴在各选点的最显眼处，还用红、黄、白、绿各种颜色的纸，制作了许多小旗，插在选举点周围和沿路各地。选举点的桌案旁，端坐的都是助选的学生。他们投罢自己庄严的一票以后，专等着替人代写选票。待选民一到，就问“你选谁？”如果说选路百占，学生就工整地、一字不差的写上路百占的名字，如果选的是别人，就潦潦草草，似像似不像地写个名字，如果遇到一些不能正确使用民主权利，模棱两可的选民说“选谁都中，您随便写吧！”

学生们便毫不犹豫地替他写上路百占。

经过几天紧张的“选举”，人们企盼正式公布大选结果，但一直不见公布。原来是省里少数人员受郭奠五等人的巨额贿赂，把长葛改定为“青年党”的选区，只有青年党的党徒才有资格当选。就连陈大肚也蒙在鼓里，郭奠五在“高人”的授意之下，宣布退出国民党，加入青年党。上级指派郭奠五为长葛县唯一的国民大会代表。直到1948年，竞选“国大代”的真相才暴露出来。

四、身遭逆境

1948年，路百占进入中原大学学习，结业后调入许昌高中、许昌师范任教。1957年错划为“右派”，强迫到内黄、焦作等农场劳动改造，妻儿老小，弟弟妹妹都受到株连。最困难时期全家流浪乞讨，文革时期又被遣送回长葛原籍。他们多年在外，长葛已没有什么亲人，遣送人员急于“交差”，就把他们推给老城公社陈尧大队他岳父家。岳父家亦无人，被指定住在生产队猪场旁的一间露天小屋里，没吃、没穿、没烧，生活之苦达到了极限，只靠憨厚的村民偶然接济一点，远不能饱肚裹腹。造反派只听说他是许昌出名的“黑五类”，至于什么罪恶则一概不知。按照文革惯例，每天稀里糊涂地拉出去斗争。农村斗争的主要方式是“游街示众”，由几个大汉带领，到周围各村游街，敲锣打鼓喊口号，让各村人看看“牛、鬼、蛇、神”是什么丑样。游斗时让被斗的人脱掉鞋袜，抽去裤带用手提着裤子，赤着双脚在盛夏的热土面窝里，趟着热土面走，有时还在土面里掺上痰涎。天天挨斗的路百占，两只脚被烧成燎泡，化成脓疮，疼得钻心，也得不到任何治疗，但他坚贞不屈，从不出声。可贵的是在一次游街时，他不顾自己的伤痛，还腾出一只手，搀扶着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老人叫郭树贵，出身清贫，一生务农，为人耿直，脾气倔强，说话不讲方式，不留情面，多次指责过生产队长“分配不公、生产瞎指挥”等毛病。队长恨之入骨，平时没办法整郭树贵，趁游斗之机，诬陷说他是“坏人”，不由分说，把他揪出来塞到游斗的行列里。郭树贵年老体弱，路百占看着可怜，硬是搀扶着他到游斗结束。

四乡的农民早就听说过路百占同土豪劣绅斗争的故事，每次游斗，男女老少挤着跑着都想瞅瞅路百占是个啥模样。人们也总是看着谈论着……

五、老有所为，无私奉献

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路百占被摘掉了“右派”帽子，分配到许昌师专，任古汉语教师。胸怀宽广的路百占，丢弃前嫌，面向未来，精神抖擞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家庭困难，子女就业等问题，都推给夫人陈瑛女

士料理，自己专心致志搞教研。由于他文学底蕴深厚，口齿清新流畅，能绘声绘色地把每一节课都讲得精彩动听，特别是他讲课能够不局限于课本又不离开课本，旁征博引，谈古论今，深入浅出，从而倾倒大批学生。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出现：当他讲课时，其他班级的学生纷纷摈弃本班课程，跑到路老师的教室听讲。教室后边，门窗周围都挤得满满的，有时还不得不改在大礼堂上课。学校领导常慨叹说：“路老师能倾别人之听众而归于己，教学魅力、知识水准，实为许昌一流！”

许昌师专办有刊名为《语文教学通讯》的学报，路百占把当“右派”期间撰写的许多著作，在学报上连续发表。计有《诗品校记》二卷、点校《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以及短文、评价著录等。可以说路百占是许昌师专《语文教学通讯》刊物的台柱子。在古文教学上，为师专作出了很大贡献，从而也得到中共许昌市委和学校党委的高度评价。

路百占离休后，仍孜孜不倦地学习。1990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特聘为社会科学研究员，北京派人专程来许迎接。可惜路百占年事已高，重病在床，未能成行。病重期间，将珍藏了半个世纪的大批图书和毕生写作的部分专著共630册连同书柜（价值超万元）委托挚友王世荣，无偿捐献给母校——长葛县中（即今三高）。

病危时，立下临终遗嘱：把他研究楚辞等未及发表的著作，由儿子分类整理，计有《楚辞发微》、《屈原列传发微》、《屈原历史论文集》、《诗品校记》等，其他一些书籍，全部捐赠给师专图书馆；自己死后，火化了事，不要浪费国家资财。

1991年农历8月30日路百占病故。许昌市委、市政府、市政协、市教委和师专党委，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各级领导亲临致哀。许昌、长葛的初中、高中各学校和有关单位，都派代表参加了追悼会。花圈、挽联布满灵堂。参加追悼会的同志痛哭失声。从各界送的挽联中，可以窥见人们对路百占景仰、哀念之情。其中有一联云：

耿介为人，面对旧世界，敢问好人在哪里？

严谨治学，服务新中国，喜看桃李满天下！

此联对路百占铁骨铮铮的一生，作了最好的评价。

（作者魏昭聪：见前注。）

台胞杨景尧先生造福桑梓二三事

张箱文/苏东亮 座谈整理

“杨先生好，谢谢你造福桑梓的昭著义举。”“希望有更多像杨先生这样的义士，为中华之腾飞做出有益的贡献。”这是1990年12月5日上午，原河南省省长李长春，在郑州国际饭店接见并宴请杨景尧先生时说的一番话。

一

杨景尧先生，1923年10月4日出生于河南长葛县后河镇后河村。1930年到1936年就读于后河小学，1937年到1940年攻读于长葛初级中学（老城），1941年到1943年深造于河南省立安阳高中（校址在郟县），高中毕业后曾在坡胡中心小学任教一年，后任孟排小学校长二年。随着当年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先生于1949年3月由西安辗转到了台湾，后定居台中市。

到1963年，他已稍有积蓄，在台中同乡中也算有点名气。这时，屏东的三个老乡邀他合伙办实业，做冷饮生意，他便将台中的生意停了，就去屏东，谁知，去到屏东后，运气不佳，开张不久的冷饮生意碰上霍乱病兴起，生意萧条，其中一个伙计退了份子，又连续经营亏损，赔得老本都没了。这时，一个原籍巩县的人，两个孩子又有妻和弟弟，他所干的生意也赔干了，家里生计难维。找到杨先生说，从菲律宾走私可赚钱，请求借给点本钱，保证一个月就可以还。杨先生见他家里困难，又念及河南老乡的面子上，就把原合伙后仅有的少量存款取出借给他，谁知一个月过后，那人说货未卖出，还得等两个月。又过了两个月，人也不见啦……无奈杨先生只好又返回台中。有一次在台中与几个同乡说话时，有个办电影院的同乡提出让帮忙找个能写会算的人，杨景尧当时就说：“我去吧！”那人听后不信，想着景尧是个有钱的，咋会干那没面子的事，以为是开玩笑的。等那人走后，杨景尧先生给另一个同乡说：“我真的想去，求您给说说。”这位同乡见景尧认真，不了解杨景尧已经非常拮据。就问为啥出去，景尧不好明讲，只说天天在家无事，找个事解解闷。就这样景尧就去台中一个电影院当起了伙计。工作刚有三个月，一个台湾人（原在台北空军总医院认识的）去找杨景尧说：“我

退役了，想问你有啥生意做，合资也中。”杨景尧问：“你有多少钱？”那人答“十一万，不够再卖地”，杨景尧一合计说：“够了，咱到西屯建戏院。”就这样，戏院建起后，杨景尧才有了立足之地。他开始精心经营。杨先生多才多艺，酷爱文化事业，创办了业余曲剧团、豫剧团并自任编导，生意越来越红火。到1990年当年合伙投资75万元的戏院卖出价成了一亿多。

二

1988年7月，杨先生离乡40年后，第一次在香港与夫人孔淑君女士重会，勾起了杨先生难以磨灭的记忆。他与孔淑君女士是1941年在读高中时结的婚。孔女士生于1923年11月15日，小杨先生一个多月，是后河镇山孔村孔昭陞老先生之长女。女士秀外慧中，娴淑朴实，人如其名，与杨先生当时可谓郎才女貌，恩爱情深，颇受乡里赞许。婚后，1945年生一女，起名凤阁，1947年又生一子取名宗振。昔日豆蔻年华的少年夫妻，如今都是白发皓首的老人。40多年的离别情，千言万语，满腹衷肠，一时间化作热泪纵横，相视无言……难忘那新婚洞房的窃窃私语——先生握着女士的双手，入神地凝视着她那秀丽端庄的脸庞说：“你太不幸啦，怎么嫁到我家？”女士不解地问“夫君这是什么意思？”先生答道：“你没听过红颜薄命吗？因为你太漂亮啦，恐怕我们夫妻难以长久。”彼时一句戏言，后来竟成为现实。可不是吗？杨先生孤身漂泊海外，40多年下落不明，音信不通。女士天天盼、夜夜等。一个弱女，上侍奉年迈公婆，下抚育年幼儿女，独自撑起这个家，含辛茹苦，毫无怨言。身为人子未尽反哺之报，身为人夫未尽丈夫之义，身为人父未施养育之恩……杨先生陷人痛苦自责中。

1989年9月，杨先生归省到阔别40多年的长葛县后河镇——生他养他成人长大的故土。当地政府和父老乡亲对他盛情款待，言谈中，备悉孔淑君女士如何艰难奉养双亲，如何在父老乡亲的协助下对杨先生之父母恪尽生养死葬之孝道，如何不辞劳苦抚养一双儿女成人，完其成家立业之大事，自己如何忠贞不嫁体现东方女性之传统美德等。杨景尧坐不住了，睡不着了。他思虑万千，从寒地的鳧鸟拔自己的毛为儿筑巢不顾痛伤，从母章鱼痴情爱婴，忍饥肠守卵壳直到死亡，想到自己的母亲为生自己受的十月怀胎之苦，父母为养育自己成人而耗费的难以计算的心血，又想到小乌鸦生下18天出飞后就知反哺，小羊羔哺乳时知道跪着尊娘报恩，而自己呢？

他深思熟虑之后，决定为报答故土养育之恩，兴建一所以夫人的名字命

名的“淑君中学”，弘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以志永久的纪念。他原计划捐出150万元人民币，在建校过程中，他一发而不可收，相继拿出了400多万元人民币，征地82亩，建教学楼、办公楼、宿舍楼、图书室、语音室等，建筑面积达11000多平方米，可容纳1000多名学生，还开辟了大操场，使“淑君中学”成为培养“四有”新人的现代标准化学校。原河南省政协主席闫济民听说后，不仅专门为学校题写了校名，还题写了“捐资办学教书育人，造福子孙功德无量”的条幅送他。后来杨先生还在高中部开设了实验班，每人每月发给生活费50元，每人每年发两身服装。三个年级三个班，每班50人，三年共资助学生近20万元。捐资建校的消息传到台中，台中的同乡见他就称赞说：“你对家乡所做的事业显示了你真是有才华，真有魄力，真有远见。”“你这样做，让我们回去……”杨先生的好友台中市杨氏宗亲会会长杨清钦先生在杨先生的感召下，亦捐人民币40万元，紧挨淑君中学，兴建了一个“清钦纪念馆”（即娱乐中心）为“淑君中学”配套。1990年12月5日，杨先生受到了原河南省省长李长春的专门接见。1991年杨先生由台中去参加台北同乡会，台北的同乡们见面就夸他：“你给在台的同乡争了光啦！”杨先生毫不避讳地对同乡说：“不是我的功劳，是神保佑着我的，我必须得这样做，这个神是我的先人们，他们的言行时刻影响着我，是我母亲，她生我养我长大，在我困难的时候，她提醒我活下去，在她临走的时候，专门到我梦中与我告别，回家不给父老和故土留点什么，心难安哪！”“说实话，这是我为反哺谱的第一支曲。”

淑君中学建校十年来，在杨先生的关心支持下，淑君中学已毕业初、高中学生3346人，为国家输送大中专生300多名。1999年12月6日，学校的校舍及附属物经有关方面核计价值达100多万美元。杨景尧先生为使学校继续前进，他正式捐赠给了后河镇政府，自己腾出手和心来专门谱写第二支曲。

三

“离父别母四十载，重返故乡。高堂倾，坟夷墓平，心怵神伤。归盼彩娱膝下，不期乘鹤竞弃养。问苍天，知我爹娘魂在何方？化悲痛为力量，输万金建学堂，兴文教成立基金会，坊乡邑清贫优才子，尽馈膏火助寒窗。聊献我区区寸草心，报家邦。”这是1989年杨先生第一次归省之后，写下的词《满江红》。故土牵挂了他的心，每隔一段时间就回来一次。在一次次与家乡人的接触中，他了解到大陆人穷，穷的根子是科学技术落后，人才馈

乏。他就在心里打起了算盘，想了很多法子，最终想到了设立一个文教基金会，用以鼓励学子上进，攀登科技高峰。他本想回大陆不再做生意，想将积蓄全部投入到文教基金会，可又一想，那钱总会有一天会枯竭。为了让基金会永久生存下去，并使基金源源不断，他想独辟蹊径，欲将在台湾的储蓄拿大陆投资做生意，用做生意的盈利，每年向基金会增注。这想法他先存自己心里，不向人宣告，自己运筹起来，为将出世的基金会营建起造血工程。

……

1992年他向佳和高压电器有限公司投资了200万元人民币；向宇利达（深圳）粉末冶金有限公司投资了100万美元；向漯河金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入了300万元人民币；向洁达陶瓷有限公司投资了25万美元。

1993年向西安高压电器研究所投资了30万美元；向水上世界投资了50万美元；向许昌市科委科技开发投入了30万元人民币；向山东金埠石材开发有限公司投入了150万元人民币；与二瓷、葛天宾馆联合创办宝象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投资130万元人民币。

1995年向裕利达（长葛）粉末有限公司投资35万美元；向河南富基电脑图象彩印有限公司投资50万美元。

1996年又向裕利达（深圳）粉末有限公司投入100万美元，将其公司收买回来……

1995年11月24日，在杨景尧为基金会营建造血工程基本就绪后，由杨先生独自出资30万元人民币的“杨景尧文教基金会”在长葛市后河镇正式挂牌成立。同时宣告，每年将自己独资企业利润的十分之一，合资企业利润的百分之百陆续注入，年而复始，川流不息，不断扩大基金会的基金。原市委书记靳绥东为基金会成立题词道：“建学校造福乡里，设基金培育精英”。河南日报于当年11月28日对基金会成立进行了报道。后河籍博士生导师张宝林夫妇为基金会会馆落成赠送了“大展鸿图”的湘绣。

基金会以杨景尧出资征地兴建的七间三层楼房为会馆。基金会建立后，由杨景尧先生亲自主持制定了章程和一套完备而严格的管理办法，明确了性质、宗旨与任务，组织机构、基金来源、基金用途、基金管理办法、会务费用、会址、章程之解释与修订等。他在章程的宗旨与任务中明确的规定：基金会以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高中华民族文化素质为宗旨，其任务是遵照国家法规支持国民义务教育，帮助发展文化事业，通过奖励、表彰褒扬等手段，激励青年学子奋发进取，文教员工勤恳敬业，广大乡亲崇德尚义，事业有成，造福桑梓。对基金用途规定为七个方面：一、支持文化教育事业；

二、奖励家境贫寒、品学兼优、进取之青年学子；三、表彰辛勤耕耘业绩卓著，为人师表之优秀教师；四、褒扬道德高尚，行为忠孝，行仁举义、事业有成之社会人士；五、嘉勉从事或协助推行人教事业、辛勤劳苦的有功人员；六、会务开支；七、基金使用范围，以后河为中心，尽力辐射全市。该章程于基金会成立当天召开的第一次理事会议上通过，基金会也于此日正式投入运行。

在杨景尧文教基金会成立五周年特刊中有这样的记录：

1996年5月10日，杨景尧先生在淑君中学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年会，同年7月26日基金会馆落成，同年9月14日，召开了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聘请了长葛教育界的元老王静吾、闫位中、王光炜、袁耀坤、蔡根祥为顾问，并讨论审议了《助学金、奖学金及优秀教师奖励实施办法（草案）》。10月1日，基金会向原籍后河的北京画院画师田零先生举办的个人画展赞助人民币4万元，杨先生及理事许凤召先生亲赴北京祝贺。画展结束，田零先生向基金会捐赠画作80幅。在1996年10月6日召开的第三次理事（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助学金、奖学金及优秀教师奖励实施办法（修改稿）》，同年10月11日《助学金、奖学金及优秀教师奖励实施办法》在长葛市电台、电视台、《长葛报》公布。

《实施办法》公布后，基金会于10月19日正式向社会提供资助，第一次受到基金会资助的是出席后河村老人节庆祝大会的223位70岁以上老人，每人赠了一部收音机。

1996年10月30日，依照《实施办法》，对申请资助的王坦、张国伟、赵广辉等6位同学颁发了第一批助学金；11月13日，出资25000元人民币与市文化局联合举办了“长葛市第一届‘景行杯’民乐大奖赛”。评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5名，优秀奖12名。杨先生为一等奖获得者贾明仓颁发了奖杯和奖金。12月15日，根据市文联申请，由基金会出资赞助，长葛的文学刊物“葛天文学”开始筹备复刊。

1997年1月，长葛市举办首届春节文艺晚会，杨景尧出席晚会并赞助5000元人民币。

1997年7月28日，在长葛市委欢送重点高等院校录取的60多位同学大会上，基金会向郭慧敏、张遂涛、刘力文、刘现同四位同学及他们的母校教师颁发了总额为32000元的奖学金，并向培育他们成才的母校教师赠送了“劳苦功高”锦旗。

1997年9月9日，基金会对后河小学成绩优秀的师良、张柯、杨洪升

三位同学及辛勤耕耘的教师颁发奖学金及奖金共 4400 元。

1998 年 4 月 13 日，基金会根据国家自 1998 年起高招不再公布考生名次的变化，对《助学金、奖学金及优秀教师奖励实施办法》中有依照考生名次颁奖的条款予以修订。同年 8 月对市一高学生盛艳慧、李红莹、贺永刚、市三高学生梁书恩各颁奖 5000 元人民币。对淑君中学学生唐书岚、高磊、马春旺各颁奖 1000 元人民币。

上述同学的母校教师获同额奖励。为后河村老人节庆祝会捐资 4800 元。

1999 年 8 月，基金会向市一高毕业生何丽格、张江峰、王越颁奖学金各 5000 元，其母校教师获同额奖励。

9 月，基金会根据杨先生提议，召开第六次理事会，讨论制定出《关于在淑君中学颁发助学金、奖学金的实施办法》并付诸实施。

2000 年 6 月基金会应后河村党支部、村委会的申请，为修缮村中学出现裂缝的教学楼，赞助人民币 10 万元。

……

据统计，杨景尧文教基金会从设立到 2000 年底，五年中已拿出了 437964 元人民币，奖助在校大学生、高、初中学生、小学生及其母校教师 400 多人次，相继资助市文化教育事业和其它社会事业 226531 元人民币。

每当提及这些慷慨之事，杨先生总是以“反哺”、“报恩”这些言简意赅而又谦逊的语言来回答。基金会秘书长许凤召告诉我们，杨先生从 1993 年下半年回大陆以后，一直留住未走，他已将原注入 30 万元人民币的文教基金提高到 50 万美元，等基金会成立 10 周年时，再提高到 80—100 万美元。

最后，以杨先生的五言诗——《还乡抒怀》作结束语，让我们再次倾听杨先生那“为乡育英才，为国培栋梁”造福桑梓的心声。

早岁遭干戈	流离漂异乡	历尽坎坷路	饱经雨露霜
胼胝四十载	西风倍思乡	青灯伴黄卷	残月照孤床
朝朝思友于	暮暮思爹娘	归来椿萱萎	昆季悲早殇
祖莹不复见	松柏易禾粱	恍惚如隔世	锥心痛悲伤
难酬昊天恩	解囊建学庠	更设基金会	兴文助教昌
为解青衿寒	为褒贤孝良	为乡育英才	为国培栋梁
淑中十寒暑	千人毕寒窗	基金五年里	奖助百万铢
献我区区诚	心倾囊中藏	但求桃李茂	何畏鬓发苍

（整理者张箱文：曾任长葛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苏东亮：曾任长葛市侨联主席。）

八十六岁忆往

阎位中 口述/李景周 整理

我叫阎位中，原名阎宗土，曾化名阎志刚、于民，汉族，河南省长葛市石固镇花园村人。土改时家庭中农成分。1920年5月19日（公历7月4日）出生，1944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1946年6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上过晋东南抗大一分校，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过地下工作。历任乡长、区党委书记兼区长、县委秘书、县政府民（政）教（育）科科长、高中校长兼书记、文教局副局长、县人大办公室主任、县政协常务副主席等职。1984年3月离休，享受原行政15级即副地级待遇。曾多次获得许昌市和长葛市两级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称号。

我从小在本村读私塾，后来又到中岳店长葛县立三小上学堂，高小毕业后，考入在禹县的汲县印染职业学校。这所学校是汲县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后，从汲县迁到这里的。我上了一年，因家境困难，就辍学回到了本村。

一、赴延安 上抗大

1938年初，我在石固经人介绍认识了王国钧同志。王国钧同志是北京朝阳学院的学生，北京“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员，中共石固地下党小组成员。从延安回来，他的公开身份是石固南寨高等小学代理校长。他哥王范五校长，因病常不到校，所以由他代理。他是我走向革命的引路人。

我们十几位青年人就按王国钧所指的方向，准备奔赴延安。我们先到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部民运指导处，招待人员又领着我们到西安七贤庄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招待所，在招待所作短暂休息就步行去延安。整整走了9天才走到，时间是1938年7月，虽说一路上吃了不少苦，脚上打了泡，可是心里还是高兴的、愉快的。

我们到了延安以后，接待我们的同志让我们在抗大报名编队。我们是第五期我分到六大队……报到以后，首先是解决住的问题，当时在延安吃住都有困难，学校就发给我们橛头、锨等工具，让自己挖窑洞，解决住的问题。几天后听学校领导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来看望我们，我们非常高兴，夜里睡不着觉。不几天，毛主席真地来了。我们抗大学员心情非常激动，热

烈欢呼雀跃。毛主席平易近人，态度和藹可亲，说话幽默诙谐，生活艰苦朴素，穿着和普通战士差不多，很关心从各地来的爱国青年。毛主席还亲自给我们上大课，作报告。他讲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不可能一朝一夕取得胜利，要打下去，一直到我们取得彻底胜利为止。他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形势，从敌、我、友各方力量的对比作了深入浅出的分析，言简意赅，让人心服口服，很受启发，同时还讲了许多战略战术问题。听完报告以后，大家分组讨论，有不懂的问题可以提出来。

我们六大队和青年知识分子训练班与陕北公学合并组建成抗大一分校。校长何长工，副校长周春泉。学校按规定开设政治、军事两门主课。后来抗大一分校迁洛川，两个多月后，又由洛川迁到敌后山西长治八路军总司令部。

经过千里跋涉，我们终于转战到山西长治附近的大山里，和八路军总部在一起活动。朱总司令还为我们开了欢迎会。后来朱总司令还经常给我们作报告。经过半年多的学习毕业了（这批学员大部分都分配了工作）。我家因有老母，年事已高，想回家看看。学校同意了，说“回原籍搞革命也可以”。我就领了毕业证（日寇侵入长葛后遗失了），1939年8月回到了长葛。

二、干革命的曲折道路

1939年9月，我到了祥符梁小学（中共地下党员陈伯瑾办的）教书。当时，陈小孟（陈伯瑾的堂伯父）捐了几亩地，作为学田，收入归学校，维持学校开支。学校是四级两班，搞复式教学。郑晋三（新郑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是党支部书记）教三、四年级，我教一、二年级。

1940年春，因为中共地下河南省委组织遭到破坏，长葛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了陈伯瑾。陈被押在洛阳劳动集中营，在狱中受尽了折磨，但他严守党的机密，只说自己是个教书的，并非什么共产党，表现非常坚强，宁死不屈。敌人没有捞到任何供词，又无任何真凭实据，也拿他没有什么办法。再加上陈伯瑾的父亲陈冠群是国民党军队的中将将领，活动了胡宗南，胡下令释放了陈伯瑾。

在逮捕陈伯瑾的同时，国民党长葛县党部和县政府通缉曾在抗大学习过的阎宗土。于是，我不得不改名阎位中，到禹县郭庄小学教书，进行隐蔽。后又觉得形势逼人，又去西安找同村的王土成（一同去抗大，俺俩关系很好）。王在西安国民党办的战干团干事，他在学生处给我报了个名，我化名阎志刚又改了籍贯，说是河北磁县人。我在战干团待了三个月，原来的指导员李佐臣不怎么反动，后又换成了万镇远，这家伙很反动。我看不能存身，

就想逃出战干团。当时，有老乡袁宏仁、袁宏信（石固南袁庄人）在那里当采买，有采买员证可以自由出入，于是我就借机逃出了战干团。以后又听说王土成在郑州铁路局国民党特别党部工作，我又去找他。他暗地里给我弄了个国民党党员假证件，这样我又可以公开身份回长葛了。

1941年，我回到石固，在石固见到了中共地下党员周悦然。周在石固担任国民党石固镇副镇长兼石固中心小学校长。周与县教育科科长很熟，就让我到老杨庄小学教书。1944年5月，日寇进犯中原，周悦然镇长领导镇公所人员转移到东胡村，陈伯瑾、周悦然、陈宝善、张子祥、王如镜、单子焕、郑发昌和我等30多位同志在东胡一带对日寇进行伏击，终因敌众我寡不得不撤离转移，分散隐蔽。

三、从豫西到鄂豫皖中原突围

1944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原，国民党40万军队不抵抗，节节败退，望风而逃。豫西40多个县城相继沦陷。1944年12月，我经密、禹、新三县联合办事处主任郑建中同志介绍在办事处工作，担任秘书，办事处无固定地址，是随独立团进行活动的。

1945年底，我豫西根据地部队由王树声同志率领，奉命撤退到大别山和信阳一带，与郑位三、李先念同志领导的部队合并，组建中原军区和中原解放军。原来担任荥阳汜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的赵吉甫同志担任应（山）随县县长。担任密、禹、新三县联合办事处主任的郑建中同志任信（阳）确（山）县县长。我在信确县西北的王岗乡担任六个月的乡长，到1946年6月突围离开信确县。当时我的名字叫于民。

1945年10月10日，毛主席赴重庆谈判，让出南方8块解放区（包括大别山桐柏山一带的中原解放区）。在中原解放区周围，蒋介石布置了20多万军队，妄想把中原地区共产党领导的三万多抗日有功部队一口吃掉。党组织决定皮定钧部队向苏北方向突围，诱敌尾追。大部队西去陕北，地方干部分别化装突围。1946年6月，在化装突围之前，我由县委书记蔡云生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施转移时，县委书记蔡云生叫我化装为一个戴礼帽穿长衫的教书先生，由柳林一位开茶店的老板（民主人士）送进车站，坐在国民党一个军用列车上，回到许昌，在赵吉甫一开理发店的亲戚的掩护下回到长葛。

四、十四兵站和水东情报站

1946年10月至1948年春，我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十四兵站情报员，负责搜集中原特别是郑州、开封、平汉、陇海一带的情报工作。当时有

我（化名于民）、陈镜波（陈英）、郑建中等。1946年11月，我又被派到开封、郑州、许昌等地搜集了解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设置等情报。1947年8月，我在许昌邮政局趁局长辛香山夜里外出之机与辛金生（局长之弟）打开邮政局机密柜，将国民党军队的机密番号、驻防地点的“驻军调查表”抄录下来，连夜送往十四兵站情报处。另外我们还将许昌国民党军队的驻军布防情况、工事火力设置等情况绘制成详细地图并附加说明材料，送给交通员带回解放区，交给十四兵站。

我们当时归二野水东情报站赵吉甫、李文彬领导。送的情报对解放许昌作出了重要贡献，曾受到二野领导的表扬。二野参谋长李达在给许西县县长赵吉甫的信中说，这是“解放战争以来我军收到的最全面最详细的一份材料，是最完整的敌军布防图。”

1947年7月中旬，我从开封回长葛，不敢在和尚桥下火车，怕出事，就在官亭下了火车，到阁楼学校找地下党组织。因情况不明，不敢直接去阁楼小学，就到陈英（中共地下党长葛县委书记）的爱人周曦光（群众叫她小周先儿）的住处——北小庄。晚饭的时候，我刚进村，觉得事情有变，就赶紧离去了。后来听说国民党反动区长郭奠五，国民党长葛自卫队长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杨德把陈英杀害了，郑建中同志也被杀害了。张子祥同志（地下共产党员）也被石固杨怀恩等坏人杀害。

1947年12月15日许昌解放后，我仍在河南军区办事处主任赵吉甫领导下做情报侦察工作。

五、开辟新区

1948年春，豫皖苏军区五分区决定设立许西县和沙北县。许西县辖许昌、长葛铁路以西部分和禹县大部分，分五个区。许西县委代理书记兼县大队政治委员是张泮英，赵吉甫任县长兼县大队队长，马云生任县委副书记。我是五区区委书记兼区长，在石固一带开辟创建工作。1948年4月，在一次剿匪中，我被匪徒的子弹打中了，腰下部受了重伤。我住院治了几天，仍不能行走。领导给我配了一匹马。我骑着马参加战斗，做工作，下了马仍行动不便，先是拄着双拐艰难地行走，后来拄着单拐勉强行走，我都一直坚持认真工作，从不敢懈怠。

1948年6月20日，河南省会开封第一次解放，形势发生了根本转变。

在开创石固区工作时，形势尚不稳定，石固周围还有许多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和土匪危害群众，影响社会安定。1948年7月以来，相继镇压了一帮土匪。7月，石固区人民政府经上级批准枪毙了董发林和一个外号叫飞贼

的土匪以及李石滚。9月，许西县人民政府活捉了灵井伪镇长李殿彦。11月1日，石固区人民政府公审枪毙了安金生。11月15日，许西县长赵吉甫和我在杜寨公审镇压了蔡老六和蔡老八，在和尚桥捉拿了徐金木。公安局侦察员李玉卿又在密县活捉了李丙寅。1948年10月，长葛县保安团在张惠民率领下起义，岳狗头已向豫东逃窜，被迫于1948年10月在陈留起义。到此公开的土匪已经基本肃清，形势已经基本稳定。加上郑州已于1948年10月20日解放，撤销许西县建制势在必行，于是就撤销了许西县和长洧县，恢复了长葛县和洧川县的建制。1949年，我由县委书记改任县人民政府的民（政）教（育）科科长，后又任县委书记，1950年6月又任城关区区委书记兼区长。

六、十六年的教育工作

1952年—1967年，我在长葛一中担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

1952年，中共长葛县委为了贯彻中共中央、省、地委加强教育战线的党的领导，决定派我、陈耀南和于建科到长葛中学，我担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

16年中，学校由3班学生100多人，发展到18班1000多人，由初中发展为完中。

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不少骨干教师被打成“右派”，给学校工作带来很大影响，有一些课程一时没有教师担任。1958年大炼钢铁时，初二学生到官亭炼焦，初三学生到禹县炼钢铁，高中学生到鲁山淘铁砂，打乱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石象打擂”也影响了一些教师特别是老教师的情绪。这些困难和问题经过努力都慢慢得到了解决。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对学校的破坏性更大，我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经常写检查挨批斗，参加劳动，如收拾厕所、半夜起来卸煤车等。1967年2月，我被下放花园村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8年4月7日，中共许昌市委组织部许组干审（78）02号文件“关于阎位中同志担任情侦工作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中说：“这段革命历史应该认定”，“‘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批判应予平反”。到此，我被歪曲的历史问题终于澄清，平反昭雪。

七、三年的政协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声春雷，全民欢腾，我又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先是被任命为文教局副局长，后又到县人大办公室任办公室主任，组建人大工作。1981年4月又到政协参加组建政协的筹备工作，担任常务副主席。

八、结束语

我的座右铭是：

理想永存，政治清醒。

与时俱进，不随时弊。

清心宽欲，淡泊名利。

知足常乐，读书学习。

2006年5月

(整理者李景周：曾任长葛县教育科副科长、二高语文教师。)

中国职业探险第一人——刘雨田

张水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外许多媒体都多次报道过的长葛籍探险家、旅行家刘雨田先生的伟大壮举。采访过他的人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最初是奇，继而是怪。他的奇，奇在从1984年至1997年短短13年就完成了85个探险项目，其中一些是世界级著名探险家如斯文海定、斯坦因、普尔热瓦斯基都不敢问津的项目。因而世界传媒评价刘雨田为二十世纪罕见的旅行家、探险家。他的怪，就怪在装束、习性、思维和语言表达。他留一头披肩长发，而且是乱糟糟的从不梳理，一叠蓝色的T恤衫从年头穿到年尾，无论住宾馆还是居家，他都睡在阳台上。他闭门打坐、看书、写作时，常常是两三天不吃不喝。他的思维和语言难以捕捉，时不时还有些玄妙的手势和体语。他说话时声音低低的，有些方言，若不清楚再问他一句，他就说一切都是符号，什么都是或什么都不是。一旦接收了他的那些特殊的信号，你会觉得他的思想深不可测，同时又简单如婴，这是他生命中的感情和天性中的善良。

刘雨田先生1942年2月26日出生于长葛市老城镇卢庄村，曾就读于长葛一中，1961年随父母到新疆，乌鲁木齐市二中毕业后到铁路局工作。1984年5月开始徒步走完万里长城之后，他又徒步穿越丝绸之路、黄土高原，三次探险罗布泊，三次试登喀喇昆仑雪山，考察了神农架野人、喜马拉雅雪人、绒布冰川，两次试登珠穆朗玛峰，四次穿越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穿越古尔班通古特等中国五大沙漠……

刘雨田先生为了祖国的探险事业，舍弃个人的一切，置生死于度外，历经沧桑，硕果累累，成为中国职业探险第一人，为世人所敬仰。他为全中国人民争了光，家乡人民为有这样一位驰名中外的职业探险家感到自豪和欣慰。现根据搜集到的资料整理如下，还请知情者撰写出更详细的资料予以补充。

挑战人生

在乌鲁木齐铁路局工作期间，刘雨田看到几则消息：长城学权威人士罗哲文说：“迄今尚无人全部游历过长城。”法国作家雅克·查滋曼表示：一生最大的梦想是到中国，从长城的这一端走到另一端；一位美国人先后向驻华大使发了200余封信，要求步行中国长城。“一石激起千层浪”，面对外国人的挑战，刘雨田慷慨地表示：中国人的长城，为什么中国人不先走？1984年5月13日，他毅然舍弃一切，带着指南针、望远镜、照相机、地图、笔记本、水壶、毯子、匕首、打狼棍等必备用品，从长城的最西端嘉峪关，开始徒步考察万里长城。途经沙漠的第五天，太阳好象炼钢炉上的火花一样，直射到他的皮肤上，到下午三、四点钟，突然感到背后有点阴凉，天黑压压的，倾刻间乌云密布，一股股黄龙巨柱拔地而起。他取出照像机刚按下快门，沙浪咆哮而来。刘雨田躲到一隆起的沙丘背后，用刀刨出一个小坑，将棍插入沙地，用大衣把身体裹紧。狂怒的沙暴能将火车掀翻，能把牲畜刮之几里地远，能在数秒内把人口鼻封住，使人窒息身亡。刘雨田牢牢抓住木棍，不断抖落身上的黄沙，持续了几个小时，沙暴才退去。

1984年冬，正在贺兰山脉艰苦行进的刘雨田，从收音机里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他徒步考察长城的消息，竟然放声大哭，深感自己是祖国真正意义上的儿子，与祖国母亲血脉相通了。在崇山峻岭中艰难行走的刘雨田，曾深夜受到过二十多只狼的围攻，曾失脚落人过滔滔黄河。在沿途民众的帮助下化险为夷，渡过难关。经过近两年的长途跋涉，行程6000多公里，于1986年4月5日正午时分，终于抵达长城的东端——山海关。刘雨田将一面小小的五星红旗高高举起，成为徒步中国长城的世界第一人。这次探险积累了大量珍贵的资料和照片，他将自己的感受撰写成文，题目叫《为了母亲的微笑》在报上刊登后，还被收入《中学生课外补充阅读教材》。

不解之谜

1986年11月11日，刘雨田开始徒步穿越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到达准噶尔盆地南沿时，最低气温零下39摄氏度，他的手、足和鼻腔被严重冻伤，双脚不能行走被迫爬行。此时刘雨田长发蓬乱，面目全非，加上语言不通，被当地牧民当作“特务”押至福海县政府。他穿越准噶尔盆地的消息

突然断了音讯，各地区都在寻找他，一位副县长认出了他就是探险的刘雨田。豪放热情的哈萨克人用热炕、烧酒、羊肉盛情款待这位刚从冰天雪地里出来的探险家。此时，刘雨田身上的冻伤开始破裂化脓，遍体通红，四肢肿胀，经医院检查是败血症。仅仅躺了三天的他就出院，十天后行至乌伦古河口，昏倒在182团，整整七天七夜。医生每天给他注射840万单位青霉素，病情控制不住。一天，他听见医生说：“腿保不住了，得锯。”痛苦中的刘雨田更是心如刀割，不！不能啊！他要顽强抗争。从报上得知，法国有一探险人要徒步考察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他坐卧不安，用拳头猛捶自己的病腿，最后拔掉输液的吊针，翻身下床收拾了行装，不顾医生劝阻，毅然离开医院。那天早晨天气晴朗，下午一场大风之后气温下降至零下十几度，飞沙漫天狂舞。重回冰天雪地的大自然，他觉得病状减轻，一周后四肢肿胀渐消，伤口慢慢愈合，这是现代医学无法解释的现象。此后，他身体有了特殊变化，就是不能在温暖的屋子里逗留时间太久，不管春夏秋冬、酷暑严寒，始终身着一身运动衣在户外活动，睡眠通常在室外，哪怕风吹雨淋。这是他走出准噶尔盆地后的一种生理变化。

刘雨田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时，地表温度有时高达80摄氏度，皮肤被烤得脱了一层又一层皮，嘴唇、舌面鼓起豆粒般的血泡，喉咙里胀起一个血球，他大喊大叫，震破了血球咽下自己的鲜血。经过两次穿越，两次都失败了。第三次是从1988年元月27日开始，这次他吸取前两次失败的教训，总结了经验，经过两个多月跋涉，终于成功地征服了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此时的刘雨田血管下陷，皮肤粗糙，头发几乎掉光，从这时开始，他不再理发。如今乌发披肩，他说这是死亡纪念物。

历经磨难

刘雨田先生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超人的顽强意志，战胜了征途上的艰难险阻，他身经磨难，九死一生，完成了一个个伟大壮举。其艰辛和痛苦用文字是难以表达的。在腾格里遇上过铺天盖地大沙暴和寒流冰雹的袭击；在贺兰山考察岩画时，被困在悬崖上，上不去下不来，脚下是万丈深渊；在罗布泊，身负100多斤的水、干粮和行装，半个月不见人烟，在风暴中迷失了方向；在神农架遭一群野狼追踪；穿越死亡之海时，弹尽粮绝八天八夜，逼得喝自己的尿，吃蚂蚁、蜘蛛、苍蝇，体重下降19公斤。

1987年，他第一次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时遇到一群维吾尔族人，这